

科索沃战争对世界 稳定的危害

复旦大学教授 朱明权

持续 78 天的科索沃战争（在西方又被称为“盟国力量行动”），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的军事侵略，已经结束了两个多月了，但是对这一战争的起因、结果和教训的深层思考还不过刚刚开始。

笔者认为，科索沃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近 10 年来美国的进攻能力和崇尚武力进攻的观念得到增强的结果。同样，科索沃战争的结局，将会进一步加强美国对进攻能力的迷信和开发进攻能力的企图，从而会推动其它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阻碍国际社会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已经作出的努力。

关于科索沃战争的起因

关于科索沃战争的起因，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5 月间，当这一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聚集在德国一个空军基地的美国军人说，“这里涉及的重要原则是，不能让侵略得逞，不能容忍种族清洗。”她还说，“我们正在重新肯定北约的核心宗旨：在欧洲土地上保卫民主、稳定和人的尊严。”然而，在许多人看来，科索沃战争是美国的一种赤裸裸霸权主义行为，是美国控制欧洲和支配世界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学者杰维斯和范·埃弗拉曾提出，在征服比较容易时战争就更有可能会发生，换言之，进攻—防御力量平衡的变化对发生战争的机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这种进攻—防御理论出发，范·埃弗拉又推断出 3 个预言：（1）在征服容易或被认为容易时，战争就会比较经常地发生；（2）比起其它国家来，具有

或自认为具有巨大进攻机会的国家会更多地发动和进行战争；（3）在具有或自认为具有巨大进攻机会时，一个国家更容易发动战争。

毫无疑问，在解释过去和预言未来时，这种进攻—防御理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分析科索沃战争的起因，以及它对今后的军备控制过程可能具有的作用时，该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进攻能力是综合性的，包括国内外的政治动员能力、筹集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等等，但最直接的无疑是首先实施打击的军事能力。

90 年代初，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与伊拉克之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最终摆脱了越南战争综合症的困扰，一种对自身进攻能力所怀的乐观主义油然而生。

如前所述，这种进攻能力是综合性的，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地位、盟国和友国的巨大支援，都是它的组成部分。但是，美国更愿意看到其先进的军事手段、特别是高科技的空中打击力量。看到美国军队打一场战争但又没有伤亡的目标基本得到实现。萨达姆·侯赛因曾经期待，严重的伤亡将导致美国人民起来反战，从而迫使美国退出战争，就象在越南战争中发生的那样。但他的希望最终没有能够实现。

空中打击的能力确实是美国赢得海湾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许多美国人过分夸大了它的作用，忘记了当时的特殊政治条件。后来这种乐观自信又因 90 年代中期美国在海地、尤其是在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的经历而得到加强。

1992年,在这个南斯拉夫联邦的前共和国出现了内战,当地的穆斯林和克族要求摆脱贝尔格莱德的控制实现独立,而塞族则加以反对。随后的两年中,西方国家曾经先后提出过几个和平计划,但都没有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强行介入和干涉波黑事务、特别是用武力迫使塞尔维亚人屈服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犹豫不决。但是,到了1995年7月,出于各种考虑,克林顿政府在北约理事会中最终同意对塞族人实施空中打击。一个月以后,美国的空军开始大规模袭击塞族控制的目标,美国海军也从亚得里亚海向他们发射巡航导弹。在此军事压力下,当年11月,波黑的塞族人和南斯拉夫联邦接受了美国所建议的代顿协议,波黑的独立得到了确认。为了执行代顿协议,美国又向波黑派出2万人的维和部队,占了总数的1/3。与许多悲观的预测相反,此后,代顿协议所规定的复杂安排运转得还算比较正常。

在波黑的经历,对美国后来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蛮横态度和霸道政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波黑内战爆发后,经过3年的犹豫,美国才开始对塞族人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在科索沃的阿族人掀起了暴力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后仅仅1年,它便对南斯拉夫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克林顿政府相信,在这种猛烈的炮火下,不出10天,贝尔格莱德就会作出西方所要求的让步,接受朗布依埃协议。

美国的军事冒险进一步受激励

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科索沃战争的进程并不象美国战略家们设想的那么顺利。尽管美国动用了武库中的许多最先进的成分,包括B-2型隐形战略轰炸机、F-117A隐形战斗机和战斧式巡航导弹,78天以后美国才赢得战争。然而,美国对自己进攻能力的乐观和自信并未因此发生动摇,因为它也是在本方几乎未遭受任何战斗伤亡的情况下,利用空战实现了所希冀的目标。同年6月21日,国防部长科恩在五角大楼的一新闻发布会上说:“驾驶轰炸机、战斗机和支援性飞机的飞行员们进行了历史上最准确的空中战役。所有美国人都应为我们的飞行员的技巧和职业精神感到骄傲。”“他们帮助写下了空中力量的辉煌历史。”克林顿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不久还狂妄地宣布:“假如有人迫害无辜平民,依据人种、民族或宗教背景进行集体的屠杀,无论这些

人是住在非洲、中欧还是其它地方,我们都有能力阻止他们,也有决心阻止他们。”

这也正如美国两位专家在《洛杉矶时报》上载文指出的:“近年来,美国已经改变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姿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便占据支配地位的防御和威慑为现在的扩大和进攻所取代。”这一点也为美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所证实:在冷战时期,美国平均每年采取2.8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9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每年5次,几乎翻了一番。美国国防部长的国防报告表明,正是为了应付增多的军事行动的需要,虽然冷战结束,从1993财年以后,美国每年用于采买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费用先是下降速度放慢,后来便呈现了上升趋势(1996财年起逐年上升)。

仿效和人人自危

可以预见,科索沃战争会从两个方面对其它国家产生负面的刺激作用。

一方面,在今天的世界上还存在着某些具有一定进攻能力以及进攻欲望的地区大国。对它们来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的炮舰政策无疑是个榜样。正如我们最近在南亚印巴对抗中所看到的。它们更可能采取以进攻为取向的对外政策。为此目的,它们又必然谋求扩大和改善自己的武库,甚至是核武库。另一方面,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的穷追不舍与南斯拉夫的被迫妥协,增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安全感,迫使它们也开始加强自己的军备建设。

与惩罚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不同,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维护人权旗帜下,对一个国家内部的种族和民族矛盾进行的武力干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种种族和民族矛盾在当今世界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当前世界上的国家不到200个,而少数民族有2,500多个,据统计,其中有200多个民族可能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试图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造成了更严重的战争危险,“因为满足它们的愿望需要更强烈和更具破坏性的变化”;它们首先会在国内“造成分裂主义的战争,这种战争反过来又会扩大化,变为国际战争”。科索沃战争的背景和过程显然证明了这一点。那些与南斯拉夫有着同样民族和种族问题的弱小国家因此感到了严重的不安。它们不仅担心境内会出现极端的分离主义运动,更担心境外大国会借此进行武装干涉。这种

担心会导致它们采取各种措施去改善和加强自身的安全。其中,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法无疑是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弱国无外交”和“落后就要挨打”是它们从科索沃战争中获得的最切实的教训。

总之,可以断言,尽管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程度不同的经济困难,科索沃战争后仍会迫使它们投入一个新的军备建设浪潮。当然,作为第一军火出口大国的美国及一些其它西方大国又会获利匪浅。据《今日美国》等报纸报道,去年美国武器销售额为71亿美元,比1997年增加14亿美元,占世界去年武器销售总额的1/3;德国和法国则紧随美国之后;从1991年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购买的武器占据世界总数的近70%。

美俄军控过程受阻

继美国加紧研究、开发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计划之后,科索沃战争对美俄推进军备控制的过程又增加了一个沉重的打击。

科索沃战争是美国绕过联合国安理会,领导北约盟国进行的一场战争。这突出暴露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怀疑和蔑视,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和俄罗斯间的相互信任,严重阻碍了两国间在军控领域的合作。其中首先受阻的是美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START)。尽管1996年美国参院就通过了这一条约,直到1999年初春,俄罗斯杜马才在当时的总理普里马科夫的劝说下接近于批准条约。但是,科索沃战争摧毁了这一希望。4月初时,俄杜马防务委员会副主席阿历克谢·阿巴托夫说,“从一种政治观点来看,当着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要考虑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所涉的法律问题是不可能的。显然杜马不会考虑它。”其次受挫的是美俄试图通过一项条约正式控制数以千计的短程(战术)核武器的努力。另外,全面核禁试条约(CTBT)也受到威胁。因为,现在俄罗斯“杜马对所有的军控和不扩散问题有着普遍的消极情绪”,全面核禁试条约“被

一些人看作一种削弱俄罗斯核力量的方法”。同样受影响的还有,修改1990年签署的欧洲常规武器条约(CFE)。以及美俄为分享有关导弹攻击的早期警告信息而建立临时联合中心的计划等等。

虽然,根据7月间美俄达成的协议,最近两国负责军控事务的高级官员就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ABM)的修改和战略核武器的削减进行了磋商。但是,可以肯定,同科索沃战争以前相比,现在两国在军备控制领域的合作受到了更多的怀疑和限制。因此,有的专家对今后一段时间美俄军控谈判的前景作出了颇为悲观的估计,认为直到克林顿离开白宫时这种谈判很可能一事无成。

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上,科索沃战争不过是个短暂的插曲。它既没有改变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也没有改变近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形态。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忽视科索沃战争对国际和平和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而美国对消除这些危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责任编辑 任建英

